

“十五”国家重点图书



翻译理论与实务丛书

罗进德 主编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SERIES

张谷若翻译艺术研究

孙迎春 编著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张谷若翻译艺术研究

孙迎春 编著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谷若翻译艺术研究/孙迎春编著.——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4.9

(翻译理论与实务丛书)

ISBN 7-5001-1255-6

I. 张... II. 孙... III. 翻译 IV. H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72459 号

出版发行/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甲 4 号(物华大厦六层)

电 话/(010)68002481 68002482

邮 编/100044

传 真/(010)68002480

电子邮件/ctpc@public.bta.net.cn

网 址/www.ctpc.com.cn

责任编辑/章婉凝

责任校对/立 序

印 刷/北京奥隆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规 格/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12.125

版 次/2004 年 9 月第一版

印 次/2004 年 9 月第一次

印 数/1-3 000

ISBN 7-5001-1255-6/H·382 定价:21.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作者简介

孙迎春，1949年生于河北阜平。1978年至1985年先后就读于西北师大外文系和河南大学外文系，分别获英语语言文学学士、硕士学位。先后在郑州大学外文系、烟台师院外语系、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山东大学威海分校翻译学院任教，现担任山东大学威海分校翻译学院院长、教授、外国语学院博士生导师、翻译学研究方向学术带头人、山东省译协副秘书长。出版发表学术著作、译作、论文、译文70余种，包括《译学大词典》（主编）（中国世界语出版社，1999）、《译学词典与翻译论文集》（主编）（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等。



一九六二年暑假赶译《游美札记》中。

为中国第四次翻译高潮贡献精品

翻译理论与实务丛书 总序

中国历史上第四次翻译高潮正在神州大地蓬勃推进,方兴未艾,景况壮观。

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三次翻译高潮: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和鸦片战争至“五四”的西学翻译。而目前这一次的翻译高潮,无论在规模上、范围上,还是在质量水平和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贡献上,都是前三次翻译高潮无法比拟的。

这一次翻译高潮的出现,首先是全球信息时代降临的结果。信息爆炸、知识爆炸,同时也就是翻译爆炸。在今日“地球村”,离开翻译谈论知识信息,是不可思议的。同时,这次翻译高潮的出现又是以中国推行改革开放新政,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代化强国之路为契机的。历史潮流滚滚向前。在人类高奏和平发展的大乐章中,翻译无疑是其中不可或缺的旋律。在中华民族复兴的大进军里,翻译必然是一支活跃的先头部队。

翻译,无论是作为文化现象、思想运动,还是作为一项职业、一种知识技能,总与所处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翻译的观念、方

法、样式、标准、风格,无不与时俱进。观察一下世界范围和中国国内的翻译实践活动和理论研究,不难得出结论:翻译确实是人类精神文明中最富活力、最敏锐的领域之一。信息时代和市场经济,决定了目前这次翻译高潮最突出的特点。较之前三次翻译高潮,这一次的翻译高潮信息量更庞大,涵盖面更广泛,题材体裁更丰富多样,方式更灵活便捷,技术装备更先进,从业人员更众多,受益者更普遍,理论研究更活跃,人才培养更具规模。如果从经济学观点看,翻译作为信息产业之一支,现在所产生的经济效益也是历史上空前的。如果说前三次翻译高潮,都是外文译入中文为主,那么这一次翻译高潮则正在改变中国在翻译上的“入超”地位,对外介绍中国和外部了解中国的迫切需要,对中译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新世纪的门槛上,我们欣喜地看到,翻译作为一门社会迫切需要、大有用处的知识技能,翻译学作为一门内涵深广的人文学科,在最近二十年的新时期有了长足发展。学翻译、教翻译、研究翻译、评论翻译和从事翻译职业的实践,已经成为与对外开放同步前行的社会文化热点之一,持续升温。翻译教学和译学理论研究,其规模之大、阵容之强、水平之高、成果之丰都是前所未有的,正引起国际翻译学术界的瞩目。中国作者的名字和作品在国际权威译学刊物上频频出现,正从一个侧面反映着我们的成就。翻译教学已经从语法为纲的语法复制型翻译模式中解放出来,已经分清了教学翻译和翻译教学这两个本不应混淆却曾长期混淆的基本概念,大学翻译课不再是外语教学的手段,而是在双语知识基础上培养口笔翻译技能的高级课程。翻译理论研究继文艺学、语言学之后,又有了美学、语篇分析、社会符号学、语言文化比较研究等从多角度研究翻译的方法或理论工具,为确立翻译学作为一门以翻译为研究对象的,开放的,跨学科的人文科学的地位奠定基础。有关翻译的知识大大地丰富和深化,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翻译及其

理论研究不应是应用语言学的一个分支,而应享有独立的学科地位。翻译教学和理论研究领域这些可喜的变化,无疑对造就高水平的翻译人才、提高我国数以十万计的翻译从业者的业务水平和工作质量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理论与实践互动,是翻译事业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在这方面有两个良好趋势值得注意。一是随着新一代翻译工作者和翻译教师、翻译研究家的迅速成长和翻译学科的壮大(以翻译学和翻译理论与实践为方向的硕士研究生教学点已有近百个,博士点约有十个),以及众多翻译学术刊物的出现,学术论文的发表,学术专著出版,特别是由于译学研究成果的可信和有用,“翻译无理论”和“翻译理论无用”的声音,除了极个别场合外已经不大听得到了。这当然是个积极的变化。二是译学著述不再是文学翻译家和大学翻译教师的专利,各行各业从事翻译工作的有心人,他们挟着丰厚的实践经验,迈步跨入这个领域,著书立说,带来一阵阵清新气息。这方面以科技翻译界贡献最为突出,其他如外交、贸易、金融、工商企业、编辑出版、对外宣传等各界,也都有作者涌现出来。翻译实务的经验以此得到总结,得以条理化、系统化,为后来人指点门径,同时也为我们的译学建设作了贡献。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互为用,有血有肉,这一趋势无疑是健康的,值得欢迎的。

这套“翻译理论与实务丛书”正是在上述喜人形势之下应运而生,编辑出版的。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作为国内惟一以翻译为特色的国家级出版机构,成立二十多年来已经陆续编辑出版数十种翻译理论与技巧类图书,其中若干种已经成为翻译研究或教学领域脍炙人口的必读书,在国内外翻译界赢得了声誉,奠定了公司在译学书籍

出版方面的领先地位。尽心竭力继续为翻译界广大专家学者、教师、从业人员、学生和人数众多的翻译爱好者提供高质量的专业读物,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现在,在已有的成绩和经验的基础上推出这套“翻译理论与实务丛书”,我们有几点想法:一、加强自主策划,提高原创性,体现信息时代和市场经济环境下翻译的新任务和新特点;二、加强实用性和针对性,不仅要反映翻译教学和研究的新趋势、新成果,更要关注科技、经济、法律、贸易、金融、旅游、传媒等非文学领域的翻译实务;三、笔译与口译兼顾,英译中与中译英兼顾,着重于中英互译和中译英;四、有选择地引进境外著作,港台海外华人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不乏佳作,立足中华语言文化,有其独特魅力,是我们的首选。

这些想法能不能实现,能不能把我们贡献精品的愿望变成现实,全靠翻译界广大学者专家、学校师生以及广大读者的支持与合作,没有这种支持与合作,我们的想法再好也只是空话而已。我们所期待的支持与合作,既包括惠赐书稿、推荐选题、介绍作者,也包括对我们已出的书发表评论,无论是表扬还是批评,都将鼓励我们把工作做得更好,是我们无任欢迎的。

丛书主编 罗进德 谨识

序一 翻译主体论与归异化考辨

辜正坤

中国的翻译家研究(或曰翻译主体研究)相对于其他研究领域尤其是翻译研究领域而言,还有相当多的空白需要填补。2003年8月12—15日,由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主办,北京大学英语系、人民文学出版社、山东大学外国语学院、烟台大学外国语学院、烟台师院外国语学院共同承办的纪念翻译家张谷若百年诞辰暨外国文学翻译研讨会在烟台师院外国语学院多功能厅举行,这可说是在集群贤讨论一些大家熟悉而又忽略了的翻译家方面填补了一个研究空白。而孙迎春教授辑撰的有关这次研讨会成果的《张谷若翻译艺术研究》一书,则用文字的形式为张谷若先生竖了一块碑,等于在中国翻译家研究的领域内开拓了又一方实实在在的新天地。可喜可贺。

张谷若先生的翻译艺术确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他的译作,我大都读过。例如托马斯·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还乡》、《无名的裘德》、狄更斯的《大卫·考坡菲》、亨利·菲尔丁的《弃儿汤姆·琼斯史》、莎士比亚的长诗《维纳斯与阿都尼》和萧伯纳的戏剧《伤心之家》等。最初读到他的第一部译作是他译的狄更斯的《大卫·考坡菲》,读后印象很深。他的译作译语地道、注释丰富、译作笔下的人物往往保留着原作中人物的那种鲜明的个性,此点在如何翻译对话方面尤其具有特色。例如狄更斯小说中的有些人物因未受过充分教育,出语俚俗,狄更斯往往用独特的拼写模仿他们的误读、误用字眼或不规范的口语。这些东西本来很难译,但是张先

生很巧妙地采用某种类似中国方言土语的方式来进行仿译,用心良苦,曲径通幽,确实达到了艺术效果绝佳的境界。

翻译主体概念厘定

翻译家研究或曰翻译主体研究,在整个翻译研究框架中是不可或缺的一环。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我开设的翻译课中,为讲解的方便,我曾提出宏观翻译学与微观翻译学框架。这是一个涵盖若干方面、具有若干层次的翻译学研究大系统,主要包括元翻译研究和泛翻译研究两大类;在这两大类之下,尚有若干子系统,例如翻译本体理论研究、翻译技巧研究、翻译作品研究、翻译家研究、翻译史研究、翻译文学研究、翻译文化研究、翻译相关学科研究等。而囊括这一切研究的研究,即我所谓理之理的研究,则是玄理翻译学研究。我提到这一翻译理论的大框架,是要在这一框架中彰显出其中某些尚未充分展开的研究领域。例如翻译家研究和玄理翻译学研究。在玄理翻译学研究方面,我写了《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和《玄理翻译学》(Metatranslatology)两篇长文;在翻译家研究方面,则所论不多。而孙迎春教授所编著的这个专集,恰好是一本论翻译家的专著,在中国目前的数量不多的同类著作中,具有相当的代表性,我正好想借此作序机会申述有关翻译主体研究的想法。

翻译家研究在整个翻译研究系统中,本来应该引起重视,但是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数十年来受到了忽略。值得庆幸的是,这个问题最近引起越来越多的同行的注意。顺便说一下,对翻译家研究这个领域,许多学者喜欢称之为翻译主体研究。“翻译主体”这个提法,我最初是1982年使用的。比我早一点是否有人在翻译界用过,不得而知。1982年,我的《翻译标准多元化》初稿草成,并在一个全国性翻译讲习班上讲述过,其中就有多处提到“翻译的主体”这个术语。后来该文的前面部分以《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在

《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刊》(1988年第1期第48—70页)和《中国翻译》上发表。我当时使用主体一词,主要是将西方哲学和美学中流行的“主体”一词移用到翻译研究领域。我在上文中曾有若干段落阐述翻译主体本身的特点,例如审美情趣等如何影响对翻译标准本身的认识和厘定。我在该文“2.2.人类审美趣味多样化”一节中说:“以上以翻译为本位来论证翻译标准多元化是翻译本身多功能的必然结果。我们现在把翻译本身和进行翻译、欣赏翻译的主体对立起来,会发现翻译标准多元化的另一客观原因,即人类审美趣味的多样化。”^①我重新引证这段话是想请有兴趣的读者注意,我这里提到了两个主体,进行翻译的主体是译者,欣赏翻译的主体是读者。我其实是暗示了还有第三个主体,即作者——创作了原作的人。一个主体之为主体与否,取决于该主体在某一特定行为状态中的功能。在哲学意义上,主体通常指人。但是将主体概念引进到翻译领域时,却不得不进行调整,依据不同种类的行为或状态中的人而有不同的主体。依据这种逻辑推演,其实主体还可以有别的种类。例如,从翻译批评鉴赏的角度看,还有翻译批评主体。由于翻译这个词有时被模糊使用,可以表示“译作”、“翻译行为”、“翻译过程”等意,翻译主体这个提法在表意上有时也就可能有模糊性。因此,按我的分类,就翻译行为的指向目标或依据而言,有原作主体;就翻译行为和过程的执行者而言,有翻译行为主体;就翻译结果(译作)的作用对象而言,有翻译读者主体;就翻译作品评价机制的施动者而言,有翻译批评主体。这就至少有了四种主体概念,如此等等。翻译主体研究的提法并不太理想,有笼统性,有时还不如用翻译家研究这样的字眼明白易懂。当然,提法的含义只要界定清楚了,大家愿意沿用旧的法,我也不反对。因此,在

^① 辜正坤:《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刊》1988年第1期,第63页。

目前的学术条件下,两种术语我都交替使用。

从佛经翻译看古代翻译家的地位

翻译家研究这个领域在中国其实很早就有人涉足。南朝梁僧佑《出三藏记》中的《述列传》即是翻译家的传记,包含佛经翻译家32人。但是关于译家的记载还有不少。单是从2至11世纪这1000年内,中国汉语系佛教翻译业就一直在进行,据有关记载,共译各类经律论三藏计1690余部,6420余卷。参与的译者中的高手绝不少于200人。值得提到的是,这些翻译家中还有若干译者是外国来的译者。如印度的昙无讫、佛驮跋陀罗、菩提流支,巴基斯坦的那崛多和施护,阿富汗的般若,柬埔寨的曼陀罗仙和僧伽婆罗,以及斯里兰卡的弘传密教的不空三藏等,都是颇有名气的译者,他们共同谱写了中外译者同创翻译伟业的不朽篇章。如果说现当代的翻译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的话,则古代的翻译家却是受到相当高的礼遇的。以大翻译家鸠摩罗什而言,前秦苻坚时代的统治者为了得到他的学问和翻译才华,不惜调兵遣将,灭掉邻国。鸠摩罗什后来为吕光所得。姚秦时代,吕隆来降,鸠摩罗什进入中原,姚兴让他主办译场,相当于中央编译学院,共翻译佛经三百余卷,参加译事者达三千人。所有参与译事者都由姚秦政府发工资,吃皇粮,地位甚高。^①

特别值得一提的则是大家熟知的唐玄奘。在中国的佛教翻译史上,竺法护、鸠摩罗什、真谛、义净、不空等五位译经三藏译出的经典总量是499部,1222卷,然而玄奘一人就译出经典76部,计1347卷。^② 这比前五位翻译家所译总数还多125卷,差不多是平

① 参见南怀瑾《鸠摩罗什与僧肇》一文。

② 一说玄奘一生共译佛教经论75部1335卷。

均五天翻译一卷梵本。这种速度和数量,在世界翻译史上恐怕也是空前的。玄奘作为翻译家功高盖世,其名声可谓光昭日月。唐德元年(664年),玄奘在开始翻译《大宝积经》不久后逝世于玉华宫。他的追悼会的盛况可说是旷古未有。单是在安葬玄奘那天,送葬者就达一百多万人!据说有三万多人露宿其墓旁!

中国当代翻译家的尴尬地位

但是在中国当代,翻译家的地位比之古代,可就差得太多了。别的不说,只从当今出版社所出版译作的署名问题上就看得出来。有的出版社只将原作者署于封面,而将译者署于扉页,或者署于某个不显眼的位置,或者干脆不署名。要不然就变个法将作者姓名用大号字印,而将译者姓名用小号字印,骨子里跟某些妇道人家害怕别人贪了自己的小便宜一样生怕译者沾了原作者的光。这种小肚鸡肠是可怜的。看了许多国外的出版物,这种毛病很少。即使中国古代或早期的出版物,也不是这样故意贬低译者。查《中华大藏经》和《永乐北藏》中的成千上万卷经卷,无一卷不是作者和译者署在同样的书页上,用同样的字体。众生本来是平等的,故意排列出等级,是中国当代出版者的嫉妒心理在作怪。因为有的出版人低声咕哝什么原作是名人,而译者好像不是名人,因此,作者译者署了同类的名,就害怕不小心竟让译者也和作者同样风光——这岂能够忍受!且慢,译者署的既是译名,其功能与劳动性质,一目了然,并无人会傻到以为那书就是译者自己写出的东西,也并无人会傻到认为译者和作者的贡献一样的大。所以,担心译者揩了作者的名声的油的,并不是一般读者,其实还是中国当代的某些出版者。奇怪的是,中国的译者往往温驯,很少有人提出这种疑问,情愿让出版家宰割。但是,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译者署名问题,而是中国译者本身的地位问题!因此,我不得不借为《张谷若翻译艺术研

究》一书作序的机会,重申应该给予译者应得的社会地位。

翻译活动与创作活动价值比较

译者地位问题同时牵涉到的是翻译与创作的劳动价值问题。

说没有翻译就没有西方的文艺复兴,就没有西方的现代文化,就没有社会主义国家,就没有中国共产党……这已经是老话题了。没人反对,可也没有因此就让中国当代社会普遍认同中国翻译家或翻译理论家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性。翻译家通常仍然在社会地位的舞台上处于边缘地位。而对于创作者而言,进入社会注意中心的机遇要大得多。

中国社会之所以有时重作者而轻译者,是因为出于一种假定:翻译比创作容易。但我们知道,这个假定是似是而非的。实际情形是:有时候翻译比创作容易,有时候翻译比创作困难,不能一概而论。严复先生的“一名之立,旬月踟躇”的说法,即已经道出翻译之不易。鲁迅最初以为翻译比创作容易,后来亦推翻前说,认为翻译比创作难。因为创作时遇到写不出的字眼或意境可以避开不写,翻译却不能逃避,使得译者译得“头昏眼花,好像在脑子里摸一个急于開箱子的钥匙,却没有。”^① 鲁迅这样的文字大师,其创作中的句子常为学者引述,推为佳句;其翻译作品中的句子却不免有人诟病者,目为拙句。同出大师手笔,何以有此差别?翻译难于创作者是也!所以鲁迅作为一个翻译家的成就比不上他作为一个创作家的声望,是可以明白的。其实,创作只需精通一门语言,翻译却需精通至少两门语言,这个成倍的差别本来不言而喻,却居然被许多人忽略。翻译有坏的翻译,创作也有坏的创作。就中国出版界来看,以所谓创作名义而写出的垃圾作品比翻译方面的垃圾

^① 鲁迅:《题未定草》,见《且介亭文集》。

作品要多得多！大多数的翻译家，如转而著述，不能胜任者很少；而大多数的著述者，如转而做翻译，则肯定不称职者要多得多！古今中外都有不少少年诗人、小说家，却很少有少年翻译家，也是这个道理。

由此再回到有关翻译家研究专著的问题。讨论翻译家的专著远少于讨论作家、诗人的专著。著名作家很多，著名翻译家却较少。这其中的一个关键原因是：对著名作家的批评一般需要精通一门语言就行了，对于翻译家的批评却需要至少精通两门语言，这种对评者本身的高要求，使得有资格参与评论译者的学者相当的少，从而有关的论文也就要少得多，这就连锁性造成相对小的社会影响。普通读者可以对一般的文学创作指手划脚，但对于翻译作品却往往只能沉默，因为对翻译作品的评价要求评者除了兼通双语，还得兼通翻译术和审美鉴赏能力。上乘的诗歌翻译家用母语写诗，是很容易就办得到的；上乘的小说翻译家也不难用母语写出较好的小说来。但是上乘的诗人或小说家却未必能够翻译出上乘的小说或诗歌，除非他兼通双语。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对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的研究相对于对一般著述者的研究来说，就是一种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的翻译家研究成果与中国翻译名家辈出的现象不能成为正比，也就可以理解了。

地道的译文与地道的原文 ——归化与异化论

张谷若先生不仅翻译艺术是一流的，其翻译观点也是一流的。他提倡用地道的译文译地道的原文，可以说至今是许多大翻译家所遵循的路子。当然，我在认同这个观点的时候，并非认为这是惟一正确的翻译途径。根据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翻译的标准可以有若干种，翻译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采取他认为最能表达

原作精神与形式的若干种翻译手段。可是,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并不认为每一种标准在任何时候都是同等重要的。在特定的时代和场合,相对于不同接受对象和译文发挥的特定环境,某个或某类翻译标准可以是主标准,其他标准则是辅助性次标准。例如在处理内容与形式、直译与意译、神似与形似之类的问题时,我的看法是:在较多的场合,内容的传输比形式重要,但是在有些场合,形式的意义可以大于内容,只是这种场合具有特殊性,并不很多,例如个别主要以诗行排列形式取胜的诗歌。神似、形似应该相互契合、依存,孰先孰后,依具体条件而定,没有固定的程式,更不必机械规定出谁是永远的老大或永远的老二的顺序。我在《欣看译海新涛兼论译坛三病——序黄新渠教授〈译海浪花〉》中曾谈到对上述问题的看法:

“译道近乎文道,译道乖违处,必与文道通病。

译道一病,病在声高曲下。译者取材固伟,而译才平庸,于原作巧思杰构,无所会心。然而以西语既通,遂不自量力,强为译事。风格之奥妙处不能达,构意之精微处不能传。且遣词尘下,造句鄙陋,所谓文乖而听,听无宫羽,声高曲下,空惊偶俗之唱是也。

译道二病,病在放诞夸饰。原作或以理胜,质多而文少,译者宜乎追踪旨趣,不当弄墨舞文,徒以蛇足美语赘害其思。虽有珍词绣句,不得其所,以其诞妄徒逞悦目之美,致成老氏美言不信之叹,闻之者足戒。

译道三病,病在株守形似。形似固非病,病在株守。中西文字,形音大异;词法句法,迥然不同。偶或近似,涉笔成趣可为佳译,然应适可而止,不当引为通例。然古今译坛,均有译人以重浊为气质,以鄙直为形似,以冗长为繁富。斤比于字句之间,株守于形音之畔。诘屈聱牙,而自诩忠实。此法用于宗教或科技翻译,或